

莱芜战役：舍南求北出奇兵

■曹亚铂 刘承波 丁辰



华东野战军一部由鲁南向莱芜急进。



莱芜战役纪念馆展厅。

1947年2月20日至23日，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于莱芜城内歼灭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此役，我军歼敌1个绥靖区前进指挥所、2个军、7个师共5.6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鲁南会战”计划，夺取了华东战场的主动权，使全国战局发生重大变化。同时，莱芜战役作为华东野战军转入内线纵深腹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运动战，为进军进行大规模运动歼灭战提供了重要经验。

审时度势，积极求变。鲁南战役后，国民党错误判断华东解放军“伤亡惨重，续战能力不强”，主力必固守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于是急调53个旅31万余人，组织“鲁南会战”，企图迫使华东野战军在临沂附近与之决战，进而完全占领山东解放区。国民党分南北两线，以临沂、蒙阴为目标，实施南北对进、两面夹击。敌南线由整编第19军军长欧震指挥8个整编师（军）为主要突击兵团，自台儿庄、郯城、城头一线北犯临沂。敌北线由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3个整编师（军）为辅助突击兵团，自明水、周村南下进攻莱芜、新泰、蒙阴地区。

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电示，结合敌情初步定下保卫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的作战决心，准备集中兵力运动歼灭南线欧震集团，并以部分兵力阻击北线之敌。

1947年1月31日，南线国民党军开始北犯，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法，缓缓推进。

北线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迅速南下，其先头部队于2月4日占领莱芜。

此时，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陈毅、粟裕等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战场态势，积极向中央军委建议改变保卫临沂、歼灭南线之敌的作战方针，集中兵力北上运动歼击李仙洲集团。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华东野战军同意执行转兵北线的作战方案，并指示“对外装作打南线模样”，待李仙洲深入后再秘密调动全军。6日至7日，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进攻白塔埠，一举歼灭起义后又叛变的国民党军郝鹏举部2个师，俘虏郝鹏举。

华东野战军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的同时，密切关注战场形势，并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作战计划，为赢得战役胜利奠定了基础。

舍南求北，隐真示假。2月8日，北线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占领新泰。陈毅率华东野战军主力隐蔽兼程北上，留下2个纵队的兵力在临沂以南佯装主力实施正面防御，阻击和钳制南线敌军北进。同时，安排地方武装进逼邳州，在运河上架桥，在黄河边筹集渡船，造成西渡之假象，以迷惑敌人。实际上，我军主力正在形成对李仙洲集团合围攻击之势。

2月15日，我军按照计划主动放弃临沂地区，佯装战力不支、败军之象。南线国民党军趁此占领临沂。当晚，国民党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推断出我

军北上用兵和企图歼灭李仙洲集团的作战部署计划，于16日令李仙洲集团全线后缩。我军部队尚未完全到达预备阵地，敌人突然后撤，个别指挥官想发动攻击，吃掉李仙洲集团的“尾巴”，但陈毅、粟裕等始坚持不贸然进攻，指挥各部隐蔽向预定地区集结。广大指战员以高昂的战斗情绪，冒严寒、顶逆风、翻山越岭，边走边动员边准备，通过制造各种假象迷惑敌人。与此同时，蒋介石、陈诚听信南线部队所谓在临沂外围“歼灭共军16个旅”的虚假战绩，为“临沂大捷”所陶醉，错误判定我军放弃临沂是“伤亡巨大，不堪再战”。因此，严责王耀武擅自撤军，责令李仙洲集团再度南进，尽快实施南北夹击计划。王耀武、李仙洲只得听令将部队向前推进。18日，华东野战军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部署。直至19日，我军各部已秘密逼近莱芜东西两侧地区，即将完成战役包围时，国民党军才意识到我军的真实意图。

灵活运用兵，运动歼敌。2月20日，华东野战军第8、第9纵队主力在博山、莱芜间伏击敌第73军77师，至21日拂晓，全歼该师。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主力全线发起攻击。经2日激战，我军成功攻克莱芜城以西和以北各要点，打退守军多次反扑。至22日上午，我军将李仙洲集团指挥所、第73军主力及整编第46师围困于莱芜城内。

在王耀武的指挥下，固守无力、待援无望的李仙洲于23日率部向莱芜以北突围，退保济南和胶济路。我军查明上

述动向后，立即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的战法，有意放其突围，以4个纵队在莱芜至吐丝口镇之间设置袋形阵地，并将第2纵队部署于蒙阴地区，以防李仙洲向西南撤退，第10、第9纵队分别位于锦阳关、博山以北地区，阻击由明水、张店方向来援的国民党军。上午10时，李仙洲集团先头部队进入芦村、高家洼一线，遭到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的顽强阻击。中午，待李仙洲集团后卫刚刚撤出莱芜，第4纵队一部立即抢占莱芜城，断其退路。同时，由第1、第4、第7、第8纵队组成的东、西两突击兵团展开猛烈攻击，大胆穿插，分割围歼，逐步缩小包围圈。国民党军顿时指挥失灵，溃不成军。与我军早有秘密联系的敌整编第46师师长韩练成，临阵放弃指挥，进一步增加敌军内部的混乱。

国民党军急调大批飞机前来支援，对我阵地狂轰滥炸。我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继续向敌军发起猛攻。跟随在部队后面的支前民工队伍，抢过敌人丢下的枪支，也向敌军阵地发起冲击。面对我军猛烈攻势，敌地面部队无力挽回败局，大部被歼，李仙洲负伤被俘。王耀武得知李仙洲集团覆没，当晚即令其胶济路各部撤回济南。华东野战军乘胜扩大战果，相继解放胶济路西段的博山、淄川等10余座城镇，控制铁路200多公里，使渤海、鲁中、胶东等解放区连成一片。

史说新语

见证以身许国的木箱

■贾嘎旦增



王淦昌使用过的木箱，1999年8月由王淦昌之子王德德捐赠给中国原子能博物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收藏着一只看似普通的木箱。它表面粗糙，唯有用毛笔书写的“北京王京<10>”字样，成为特殊标识。

木箱的主人，就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淦昌。“王京”是王淦昌为了保密给自己取的化名。1971年至1978年，王淦昌随核武器研制机构从北京迁往四川。这只木箱是王淦昌当时用来装运资料的，它见证了一代科学家以身许国、隐姓埋名、保守秘密的真实故事。

王淦昌在受命领导核武器研制前，已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1941年，王淦昌发表关于探测中微子的论文，受到世界物理学界瞩目。新中国成立后，王淦昌调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55年，王淦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9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并被选为副所长。其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其意义不亚于获得一项诺贝尔奖，在国际上

引起强烈反响。

1960年底，王淦昌奉命回国。第二年，他秘密加入研制原子弹的行列。研制原子弹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最高机密，参与核心工作的专家，连身份都要严格保密。一旦参加这项任务，就意味着数十年的隐姓埋名。当组织征求个人意见时，王淦昌只说了一句：“我愿以身许国！”

唯大英雄能本色。1961年至1978年，原本名满天下的王淦昌从世界学术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他的名字变成了“王京”；通信地址变成了信箱代号；他放弃熟悉的基本粒子研究，改方向从事国家迫切需要的核应用研究；他从此再未公开发表一篇论文，再未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交流……隐姓埋名的他全身心投入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中。

在河北省怀来县的燕山脚下，王淦昌和他的团队曾进行长达数年、多达数千次的爆炸试验。试验基地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科学家和试验队员吃住

在帐篷里，工地正好处在风沙口，有时大风能把军用帐篷掀起来，有时一顿饭会遇上几次风沙，常常是一碗饭半碗沙。在艰苦的环境中，王淦昌身先士卒，带领团队完成上千个试验元件的爆轰试验，指导设计试验元件，指挥安装测试电缆等，直到最后参加试验。终于在1962年底，基本掌握了获得内爆的重要手段和试验技术。

1963年，中央决定核试验要搬到西部试验场。王淦昌回到家，让夫人帮忙准备过冬的衣服。妻子追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他随口说去西安——铁的纪律不允许他将实情告诉家人。当年赴戈壁滩原子弹试验基地工作的数千名科技人员中，56岁的王淦昌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年近花甲的他跟着一群年轻人，日日夜夜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天天摸爬滚打在茫茫戈壁中。工人们看到已经两鬓斑白的王淦昌依然那么努力工作，也都备受鼓舞。在试验场，大家亲切地叫他“王老头”。王淦昌听了十分高兴：“非常好，这说明我和工人打成一片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后第4个掌握这种具有更强大威慑力的热核武器国家。王淦昌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6年，70岁高龄的王淦昌再赴风雪弥漫的青海高原，在一望无际的“死亡之海”腹地成功进行我国第3次地下核试验。至此，中国的空中、地面和地下核试验基本走完了所有历程。

从1961年参加原子弹研制后，王淦昌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

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为我国核武器研制作出巨大贡献，立下了不朽功勋。整整17年，他一直使用“王京”这个化名，直到1978年，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出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他才在公开场合重新使用王淦昌这个名字。

多年以来，王淦昌一直对自己的工作守口如瓶，就连对妻子、儿女也从未透露过半个字。在王淦昌子女的印象中，父亲不是出国就是出差，一年到头没几天在家。用他小女儿的话说，他不是几年不着家门，就是进了家门便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忙自己的事。5个子女的婚礼，王淦昌也都因为工作原因未能参加。

舍小家只为报国家，人无名但求国有名。“两弹一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也见证了一代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以身许国、无私奉献的崇高情怀。为了早日爆响“争气弹”，挺直腰杆子，以王淦昌为代表的科学家们，甘愿放弃名满天下、功成名就的人生，投入到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科研战斗序列。为了国家的需要，他们严守保密纪律，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漠，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隐姓埋名，甘愿将自己的壮美人生，书写在为国家民族自立自强的征途上。

历史，不会忘记为国奉献的英雄。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大会，授予（追授）王淦昌等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链接历史

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

公元前259年至公元前257年，秦国起兵围攻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赵国据城坚守，并在魏、楚等国的救援下一举击溃秦军，收复部分失地。邯郸之战的胜利，暂时解除赵国的亡国危机。

坐失战机

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在长平之战中，一举击溃赵括率领的40余万赵军。战后，白起乘胜分兵攻略赵地，令司马梗率军北上攻取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命王离率军攻取皮牢（今山西省翼城县），进而准备围攻邯郸，一鼓作气攻灭赵国。

秦军的连战连胜引起韩、赵两国的极大恐慌。为此，两国派苏代为使，携带重礼游说秦相范雎，指出如果白起一举灭赵，那么他对于秦国的功劳将无人能及，就连范雎也要屈居白起之下，因此不如同意赵国割地请和，这样白起便无以为功。这一番说辞打动了范雎。范雎便以秦军久战疲弱为由，建议秦昭襄王同意韩、赵两国割地求和以休养生息。秦昭襄王采纳了这一建议，命白起退兵，白起由此对范雎心怀怨恨。

长平之战后，赵军几乎精锐尽失且士气低落，秦军挟大胜余威，正是一举灭赵的最佳时机。秦昭襄王命白起退兵无异于坐失良机，使赵国得以在惨败后整顿国防、提振士气，形势逐渐转危为安。

白起拒战

为渡过危局，赵国提出割让六城以求和，秦昭襄王应允，随后退兵。当赵孝成王准备献上割地时，赵国上卿虞卿认为割地与秦，秦势更强，不如以六城贿赂齐国，联齐抗秦。赵孝成王用其谋，派虞卿出使齐国。同时，赵国又与魏、楚等国结好，共同商讨抗秦计划。

秦昭襄王见赵国违约不割六城，反而与山东诸侯国合纵对付秦国，欲再次起兵攻赵。白起拒绝领兵出征。他认为，长平战后本是一举灭赵的良机，但此时距长平之战已过去一年时间，赵国如今上下“涕泣相哀，勤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国力已有所恢复，并且又广泛结好诸侯，达到“其国内实，其外交成”的效果。此时伐赵并非理智的选择。但秦昭襄王没有采纳白起的建议，公元前259年农历十月，秦昭襄王令王陵率军伐赵，直攻赵都邯郸。邯郸之战由此爆发。

然而，王陵作战不利，损失五校（每校约8000至10000人）。秦昭襄王欲以白起代替王陵，但白起称病不出。秦昭襄王派范雎指责白起，指出白起当年能以弱胜强，在伊阙之战和郢郢之战中大败韩魏及楚国军队，如今以强攻弱却拒绝出战。白起回答，韩、魏及楚国军队的失败乃是意料之中，他们国内朝政腐败，在战场上“各有散心，莫有斗志”，而秦军上下同欲，视死如归，秦国的胜利是“计利形势，自然之理”。而此时赵国就如越国被吴国击败后越王卧薪尝胆的情形，国君亲近大臣、大臣体恤士卒，可谓“巨人一心，上下同力”，此时伐赵必然难以获胜。见规劝不成，秦昭襄王便强令白起率军出征。白起坚持认为此时不宜伐赵，“宁伏受重诛而死，不忍为辱军之将”。白起多次拒绝出战，最终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通过白起对局势的分析可知，白起拒绝出战并非只是出于赌气，而是建立在对其形势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孙子兵法》指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战时应“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因为即使再优秀的将领，也很难做到“使敌之可胜”。由于秦国在长平之战后未能一鼓作气灭赵亡国，给了赵国喘息之机，使得秦国丧失战机。秦军围攻邯郸屡屡受挫的事实，正体现了白起的远见。

合纵破秦

白起拒战并没有阻止秦昭襄王继续攻赵，他先是派王龁代替王陵为将，



虎符作为中国历史上调兵遣将的凭证起源很早，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虎符已经行用。图为战国错金杜虎符的左半符。

邯郸之战

■于涌泉

围攻赵国都城邯郸。久攻不下之后，范雎便举荐其故交郑安平为将，率军支援王龁，加强对赵的进攻。秦军长时间的围攻使邯郸城内粮食耗尽，赵孝成王不得不向其诸侯国求救，以解邯郸之围。

赵国将希望主要寄托在魏、楚两国身上。因平原君赵胜的夫人为魏公子信陵君之姊，所以平原君多次写信向魏王和信陵君求救。魏王也曾派大将晋鄙率军10万救赵。但在秦国的恐吓下，魏王命令晋鄙待在边境按兵不动以观望。对此，信陵君采纳了门客侯嬴的计策，依靠魏王宠妃如姬盗得魏王调兵的虎符。之后又命大力士朱亥锤杀晋鄙，夺其兵权，并挑选8万精兵进击秦军以解邯郸之围。这就是“窃符救赵”。与此同时，平原君带领20名文武双全的门客前往楚国游说。在门客毛遂之力陈之下，楚王终于同意发兵，并以景阳为将率军救赵。

救援赵国的楚魏军队到达邯郸后，随即向秦军发动进攻，城中的赵国军队也趁机出击，里应外合，大败秦军。郑安平率军投降赵国，王龁退到汾城（今山西省侯马市）。此后，魏楚联军追击到河东，再次打败秦军，并趁机率复河东部分地区。到公元前256年，韩国也加入攻秦的联军之中，联军此后继续收复部分失地，连范雎的封地应城（今河南省宝丰县）也被韩国收复。

邯郸之战是秦国在取得长平大捷后遭遇的一次重大失利。此时的秦国尽管在实力上已强于各诸侯国，但邯郸之战的结果表明，秦国在面对诸侯国联军时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山东诸侯国的合纵依然是抵御秦军东进的有力武器。此后，秦国也改变了全面出击的策略，将分化瓦解诸侯国之间联盟、各个击破作为战略重点。

相关链接

虎符

虎符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为中国古代所用的调兵凭证。它是由青铜或黄金制成的伏虎形状的令牌，可以从中间分为两半，通常左半交由统兵将领，右半由统治者保管。统治者若要调兵遣将，则命人手持虎符到军中下令，两符合验后持符者方可调动军队。

历史上，虎符的形质历经变化。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南北朝时期，兵符都以铜制虎符的样式出现。隋朝时改为麟符。唐朝因为避讳李渊祖父李虎名讳，改虎符为鱼符或兔符。宋代以后，虎符逐渐被令牌取代。